



中欧关系研究简报

第五期

2012 年 10 月 28 日

清华大学（IIR）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办

主编：张利华

编辑：王 亮

目 录

【中心快讯】

第二次《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课程圆满举行.....	(3)
意大利塔兰托大学教授 Luigi Bonatti 教授来访.....	(5)
“欧元危机背景下的两难困境与悖论”学术报告会.....	(5)
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人员补充与调整.....	(6)

【研究成果】

史志钦主任接受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访谈全文.....	(7)
张利华副主任接受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访谈全文.....	(12)

【学术园地】

海峡两岸欧洲研究学术研讨会清华大学分会场会议综述.....	(16)
中欧关系与欧债危机新动向研讨会会议综述.....	(21)

[中心快讯]

第二次《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课程圆满举行

2012年10月，由国际关系学系开设的外国专家短期课程《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如期开课，这是继2011年9月我校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签署《清华—格罗宁根中欧关系研究合作协议》后，格罗宁根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第二次在我校开课。来自中、美、德、法、韩等多国的20余名国际关系的研究生选修或旁听了此课。

此课的中方负责教师是中欧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利华教授，由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 Jan Van der Harst 教授和 Frank Gaenssmantel 博士授课。Jan Van der Harst 教授和 Frank Gaenssmantel 博士都在欧洲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长期潜心钻研欧盟一体化及中欧关系，在该领域的教学经验相当丰富。1996年起，Van der Harst 教授获得“让·莫内教授”称号，主持《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和理论》研究项目，目前还担任“复旦—格罗宁根荷兰研究中心”学术主任。



Jan Van der Harst 教授在授课

中欧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近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深与欧债危机的继续，中欧关系更是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格罗宁根大学教授开设的《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课程有助于深入了解欧债危机的新动向，中欧关系面临的新挑战，丰富我系师生对欧盟及中欧关系的认识，扩展学生的知识体系和思维视野。在中欧关系全方位发展的今天，此课的开设也为中欧师生的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授课过程中，两位老师引导同学们在课前进行了适量的相关文献阅读，课堂上的英文讲授与同学们的提问讨论相结合，气氛非常活跃。Jan Van der Harst 教授主要讲授欧盟一体化的历史和进程、欧盟与成员国公民的关系、欧债危机对整个欧盟一体化的影响等；Frank Gaenssmantel 博士的讲授重点则集中在中国与欧盟关系上，包括中欧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中欧贸易关系、人权分歧、武器禁运、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两位老师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态度、幽默的语言和独特的视角吸引了全体同学的注意。对于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两位老师给出了精辟的回答，讨论环节引人入胜。

与去年相比，该课程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更强。两位老师都是第二次来清华讲课，对国关系和学生的知识结构、兴趣所在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课程安排更加符合同学们的需求。课程还特别增设了很多关于欧债危机背景下中国与欧盟合作的内容，使同学们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当今国际舞台上的合作与博弈。

两周的时间过得飞快，10月26日晚9点半，该课程的最后一节课落下了帷幕。张利华老师、授课老师与部分同学们合影留念，留下了这一美好的瞬间。在随后课程的反馈中，同学们纷纷表示学习此课受益匪浅，收获了关于欧盟一体化以及中欧关系的系统知识，了解了欧洲最新的学术动态，希望今后能开设更多的有关中欧关系研究的课程。



Frank Gaenssmantel 博士与张利华教授及部分同学合影

（撰稿人：韩一元，摄影：刘爱明）

意大利塔兰托大学教授 Luigi Bonatti 教授来访

意大利塔兰托大学（University of Trento）国际关系学院的 Luigi Bonatti 教授本学期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做访问学者。Luigi Bonatti 教授长期从事于世界经济和意大利政治研究，对国际经济学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国际关系学系开设了外国专家短期课程《理解全球经济政策：中国、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发展与危机》（Topics in global economic policy: growth and crisis in China, Europe and the U.S.）。

2012 年 10 月 22 日，Luigi Bonatti 教授与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史志钦教授和常务副主任张利华教授商讨了意大利塔兰托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开展合作研究欧盟及中欧关系问题的途径，并讨论了他所在的学院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开展教师交流和学生交换等事宜。

“欧元危机背景下的两难困境与悖论”学术报告会

2012 年 10 月 25 日上午，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召开了以“欧元危机背景下的两难困境与悖论”为议题的学术报告会，来自意大利塔兰托大学的 Luigi Bonatti 教授担任本次报告会的主讲人，到场嘉宾有：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张健研究员，德国大使馆官员 Frederic Maduraud 及 Susanne Aschi-Glesius，法国大使馆官员 Sophie Maysonnave 及 Yasmine Guedard，以及清华大学访问学者 Manuel Garcia-Perez 等。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史志钦教授主持了报告会。

Luigi Bonatti 教授的专题报告首先探讨了欧盟货币体系与欧元背后的深层次经济动机，然后从欧盟核心国与外缘国的竞争结构出发分析了意大利等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及核心国家面临的两难困境。他认为，目前危机比较严峻的国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包括政府积累了高额赤字和经济陷入停滞，因此不得不采取紧缩财政的措施控制危机恶化。而德国在应对欧债危机的同时存在许多顾虑，考虑的更多的是对于自身社会经济模式的发展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嘉宾讨论部分，西班牙学者 Manuel 对欧盟目前的困境表示出了一定担忧，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学生也表达了自己的切身感受，她认为，欧债危机确实影响到了青年一代的生活和就业问题，特别是对于危机比较严重的国家而言，因此导致大部分的欧洲人对于欧盟一体化的未来持怀疑和不确定的态度。但是，来自德国和法国驻华使馆的专家则从政治立场上表达了他们对于解决欧债危机和欧盟一体化未来发展趋势的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核心国家有信心带领欧洲走出困境，解决当前的争议问题，这是作为欧盟成员国义无反顾的义务，也需要所有欧盟国家协同努力才能够得以实现。法国大使馆的 Maysonnave 女士强调，“欧盟”的创立是非常伟大的理念，尽管欧洲一体化的历程并不顺利，但是在欧盟国家的努力之下，克

服了重重困难依然将一体化的历史任务推至今日，是值得大家对此产生信心的事业，她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充满信心，也希望能够给予更多欧洲人带来乐观的情绪。

史志钦主任在会议结束时表达了对欧债危机解决路径的积极看法，他认为欧洲有能力度过此次危机，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让欧洲一体化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撰稿人：袁帅）

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人员补充与调整

2012年10月，中欧关系研究中心进行了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的补充与调整，特聘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欧洲一体化历史与理论让·莫内教授 Jan van der Harst 兼任中心学术副主任，特聘格罗宁根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任中心理事会副主席，聘请王倩兼任中心理事会办公室秘书。

主任：史志钦

常务副主任：张利华

学术副主任：Jan van der Harst

助理：袁帅

理事会主席：郑燕康

副主席：杨世茁

副主席：曹雪飞

办公室秘书：王倩（兼）

[研究成果]

史志钦主任接受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访谈全文

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史志钦教授在 2012 年承担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中欧关系研究》项目期间接受了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实习助理 Barbarca 的访谈。史志钦教授指出,在欧洲仍处于经济危机以及美国重返亚洲的大背景下,中欧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点上,中欧关系正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中欧双方的领导人关注双方进一步合作带来的巨大利益,但是尚未找到合作的好办法。访谈围绕着以下问题展开:1) 中国如何看待与欧盟的关系;2) 中国在中欧关系中的主要关切是什么;3) 中国如何看待欧债危机以及欧盟如何解决它的问题;4) 如何看待中欧关系的未来;5) 如何改进中欧关系。下面是访谈全文。

理解中欧关系

2012 年 10 月 15 日

随着欧洲深陷经济危机、美国宣布重返亚洲,中欧关系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史志钦历数了中欧关系历史上的挑战以及未来将面临的挑战,他坚信中欧领导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深化合作所能带来的巨大收益,但迄今为止,双方都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合作途径。

中国政府如何看中欧关系?

中国非常重视中欧关系。21 世纪之交,美国继续扮演着全球性超级大国的角色,而当时的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就基于这一优势奉行更为单边的外交政策。这有悖于中国的利益,随后中国政府按照多极世界构想塑造中方外交政策。

欧洲视中国为制衡美国的一种力量,中国亦然。因此,如果不是几个关键的分歧,中欧有可能早已建立起双边互惠合作关系。

2003 年,当美国单方面决定入侵伊拉克时,美国的“单边主义”到达了顶峰。彼时,欧盟显然更倾向于多边努力,并且,中国与法国及欧盟紧密合作,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单边行动。

就此,中欧关系演变成为更牢固的伙伴关系,中国希望通过支持欧盟来制衡美国的势力。而 2003—2005 年就是中欧关系的黄金时期,当时欧盟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将这种关系定性为“虽尚未结婚,但已然订婚”(not yet a marriage, but an engagement)。

然而自 2005 年后，欧盟的对华战略开始发生了转变。随着欧元危机加剧了欧洲工业滑坡，欧盟逐渐将中国视为自身发展和维持福利水平的竞争对手和威胁。欧洲有个普遍共识：由于中国廉价商品涌入欧洲大陆，此举威胁到了欧洲本土的制造业，而这个这正是欧洲经济活力的核心。

造就中欧紧张关系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欧洲更多强硬派政治家的上台。在 2005 年之前，如德国的格哈德·施罗德 (Gerhard Schröder)、法国的雅克·希拉克 (Jacques Chirac) 等大多数西欧国家领导人奉行有利于中国的政策；然而，随着尼古拉·萨科齐 (Nicolas Sarkozy) 和安格拉·默克尔 (Angela Merkel) 的当选，法德两国对中国更加咄咄逼人。

萨科齐和默克尔曾会见达赖喇嘛 (Dalai Lama)，此举严重打击了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自 2008 年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发生骚乱、中国火炬手遭遇激进分子阻挠后，中法关系就一直高度紧张。而在中国，反法情绪也随之不断上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针对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的一系列静坐示威和骚乱。此外，中国还在 2008 年中欧峰会 (EU-China summit) 即将召开的前几天宣布取消该会议。

中欧关系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缺乏团结。因此，中国不得不分别与欧洲每个国家进行磋商，因此延缓了达成公平协议的进程并且使之愈发复杂。中国希望与欧盟建立新型的关系，但后者缓慢的决策步伐令人失望。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个会谈流程都须取得所有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而达成一致共识是很困难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即便欧盟其他国家都同意，但只要一个小国反对就可以否决整个协议。

在意识到欧盟无法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后，中国便致力于与单个国家构建双边关系；不过，中国也因欧盟国家间的竞争而获益，尽管对于欧盟的整体利益来说，这不是最优的情况。

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盟，都已经意识到有必要重新实现中欧关系正常化。鉴于这两个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中欧双方有必要进行合作。

中欧关系中，中方的主要关切是什么？

中国希望欧盟将中方视为真正的战略伙伴，在各方面予以平等的对待。

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变，不仅经济上实行了对外开放，同时也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上取得了卓著的进步，而这一点在近几年来尤为明显。当今的中国人，尤其是网民，对世界其他地方了解甚多：他们可以通过网络接触国际媒体，可以走出国门探游世界。很难否认中国已变得越来越自由。

当然，中国仍有不少缺陷，但是，正如邓小平形容中国发展的那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正一步步向前发展。尽管中国的进步没有达到欧洲期望的步伐，我们必须认识到中方已做出并且正在继续做出的种种努力。

欧盟国家有着发达的经济，以及惠及其民众的环保标准，而中国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期望向欧盟学习更多。然而，包括对技术转移贸易的限制在内的欧盟众多限制政策，使其难以共享信息和产品。

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往往会认为自己所持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并试图将它们强加于中国。欧洲人普遍深信欧洲的政治体系和价值观有着本质的优越性，使中国相形见绌。其实，每个国家和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这是其独特历史的产物，适应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而这种差异也助长了中国和欧盟在人权争端中的互不信任。

此外，中国对欧盟干涉中方内政非常敏感，这不仅因为中国重视主权完整，还在于中国崇尚在国际体系中平等对待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理念。一旦欧盟国家干涉如疆独藏独等议题，比如会见达赖喇嘛，中国都将其视之为对其主权的严重侵犯。

对中国而言，达赖喇嘛除了是一个宗教领袖，同样还是政治玩家。正如我们所见，达赖喇嘛领导僧侣成为了中国的异见者，这一点可以从 2008 年 3 月在西藏拉萨发生的暴乱中看出。这些威胁了中国内部的稳定，损害了中国社会的和谐，而这些都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新疆的东突(Eastern Turkestan)分裂主义者直接威胁中国的另一核心利益——领土完整。当类似的个人或集团对欧盟或美国产生威胁时，他们却被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然而在中国，每个持不同政见的人却都被视为自由的守卫者以及反抗社会压迫的领导者。

中国认为这样的双重标准会极大地损害中欧的双边关系，因为其存在就表明中国并未被平等对待。欧洲人应该看看中国的历史：新疆和西藏长久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某些时候，这些地区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另外某些时候，这些地区不是与中原地区在交战，就是侵略中原。这表明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变化的关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应被误解。

最后，还有大量象征性的因素阻碍了中欧关系。首先就是 1989 年开始的对华军售禁令，其次是拒绝承认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上述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事实表明欧盟国家并没有把中国视为一个真正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为什么欧盟对越南解除了类似限制，而对中国就不可以？中欧间人权或贸易关系的谈判就经常抛出这些多年来不断恶化的议题。

于是，中国在经济和政治商讨中逐步宣泄其不满。中方已经认定欧盟是由于美国的反对而拒绝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因此，欧盟并不具有彻底独立性。解除武器禁运将是一个强烈的

政治信号，表明欧盟有意愿深化与中国的关系；但这也仅仅是个政治信号，即便解除了对华军售禁令，欧盟也不可能向中国出售其最先进的武器。

中国如何看待欧元区危机？欧盟怎样才能解决问题？

在欧元危机愈演愈烈之时，中国政府对如希腊、西班牙等负债累累的欧盟国家施予援手。中国此举与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却在指责欧洲国家肆无忌惮的消费习惯。

当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供援助昭示中方善意的同时，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却在预测欧元即将到来的死亡。中国相信欧盟和欧元都能存活，愿意为欧盟国家提供帮助。鉴于此，危机以来，中国领导人频繁拜访欧洲——他们十分关注欧盟及其在全球的角色。

关于欧元危机，一个广泛的共识就是认为危机是欧盟机制的结构性恶果：欧盟是一个缺乏统一财政政策的货币联盟。危机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欧盟国家数十年来致力于构筑更进一步的¹经济一体化，却没有在欧盟政治一体化方面真正发力。在我看来，这一结果是那些拒绝做出选择的欧盟领导人缺乏政治意愿所致。

在中国，另一个普遍观点认为欧盟不断扩大的规模使得一体化进程变得更为复杂。吸纳经济和社会制度差异极大的国家后，欧盟成员国之间迥异的需求使得通力合作难上加难。新加入的成员国大部分来自东欧和中欧，其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盟的富裕成员国。此外，由于限制了成员国间的转移支付，新加入的国家为了赶超富裕成员国，不得不大量举债来提升生活和福利标准。

金融危机揭示了这些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欧盟的解决方案在于构建更紧密的政治联盟，而这是唯一的出路。

在这危机时刻，欧盟的另一个难题是权衡改革和其他政治优先项。正如我们所见，在今年的选举中，法国和希腊民众都将选票投给了承诺保障现有生活水准和福利水平的候选人。也就是说，人民选择了“不进行改革”。

这对欧盟债务水平和欧元区的影响程度还有待观察。事实上，由于政府领导人合法性的限制，诸如意大利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这样走马上任的技术官僚，其承诺的改革都遭遇了打折，显示了技术官僚的限制。现在，欧盟领导人必须找到融合民主和改革必要性的替代方案。

欧元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于监管金融投机，人们已经认识到，欧元区需要更多的金融监管，欧元区人民也在发出这样的呼声。然而迄今为止基本一无所成，人们仍觉得是他们而不是银行在为危机买单。

这是过去二三十年里新自由主义思潮不断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后，相应孕育的资本主义走向极端形式的后果。现在，我们看到了欧洲社会主义模式的危机。新自由主义是经济思想在二战后受到英美两国影响所致。金融机构会转向更激进的态度，他们只关注资本和利润，而不顾及社会影响。

如何看待中欧关系的未来？

美国重返亚洲被许多人解读为遏制中国的举动，防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领导者。正是因为害怕被中国所取代，美国通过在韩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加强其在亚洲的影响力；同时，美国也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加强伙伴关系。

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希望欧盟能站在中方这边，防止中国在亚洲被孤立，同时平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由于美国重返亚洲，中国试图与整个欧洲建立友好联盟关系：不再局限于西欧，还包括前苏联地区。自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彼此几乎没有了联系，如今中方已表明要成为其重要伙伴国的意图，这是现实必要性的要求。况且，欧盟的一国否决制决策机制提升了东中欧国家的重要性，使得中国可更好地利用与其中的友好关系进行相关努力。

中欧关系未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欧洲国家对中国地区安全问题将采取何种立场。在东南亚，特别考虑到中国对欧元危机的援助，中国希望欧盟能支持其行动。

在中国和菲律宾有争议的岛屿问题上，中国希望欧盟能予以自己相应的支持。从中方的立场看，这些岛屿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菲律宾不过是自 1997 年才开始声索相关领土。在此之前，它们就被公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况且，自元朝、明朝开始，中国政府就发现并管理这些岛屿。

尽管中国希望得到欧洲的支持，但如果不予支持，中方希望欧盟最低限度要保持中立，尤其是考虑到中方的历史证据和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的法律论据。

如何才能改善中欧关系？

改善中欧关系的最好办法是更好地理解彼此的价值观和利益所在。通过在区域安全议题上构建合作，中欧双方能够更好地理解各自处理安全问题的办法以及采取这些措施的价值观和理由。

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中国希望通过谈判与外交进行接触，不侵犯他国主权，而欧盟和其他欧洲国家则倚重制裁和施压来解决问题。中欧之间的分歧在伊朗核问题上一览无遗。

但是，合作有时能带来好结果，快速而有效地应对索马里沿海海盗问题即是一例。欧盟崇尚保持实力而中国则崇尚主权完整，这两套价值体系和方法能通过持续的合作逐渐磨合。

此外，欧洲人需要更加珍视中国所给予的帮助。事实上，中国感到欧洲领导人忽视中方所作的努力。在欧元危机时刻，中国领导人表明了对欧洲国家的信心，不仅发表支持性言论、访问欧洲，同时也购买欧洲债券。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欧洲国家陷入困境之际，并未嘲笑也未指责。

然而，中国的所作所为似乎并未有所回报，欧洲领导人继续指责中国，并将中国描述为欧洲的威胁。欧洲人并不应当将中国的支持看作理所当然，随着中国贸易关系的多样化，它对欧洲的需求可能会下降。

通过更好地推进文化层面的对话，改善中欧关系大有可为。尽管目前中欧对话(China-EU dialogue)已经存在，但它需要更具包容性，从而走出“精英空谈”的局面，成为大众之间的关系。

媒体在其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报道内容决定了公众意识所呈现的印象。因此，很关键的一点是促进新闻报道的公正性，而这正是西方媒体所缺乏的。一直以来，西方媒体总是报道中国大量的负面新闻和有限的正面消息，前者的一个例子就是有关 2008 年西藏骚乱报道，英国广播电台(BBC)和德国报纸错用了尼泊尔僧侣的照片。为了更好的中欧关系，两国媒体应该避免产生类似的问题。

诚然，中欧关系的未来取决于各方理解彼此利益和价值观的努力，中欧领导人对双方进行更好合作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了然于心，目前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到通力合作的有效途径。

张利华副主任接受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访谈全文

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利华教授在 2012 年承担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期间接受了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实习助理韩一元的采访，就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当今中国的对外政策谈了自己的看法。下面是访谈全文。

1. 中国传统文化涉及到中国外交与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涉及到中国外交与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就是其核心价值观——“和谐”思想。“和谐”其实是一个思想体系，它不仅有价值观念，还有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认识宇宙和人类

社会起源发展规律的太极哲学和阴阳辩证法。在这样一种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基础上，中国古代圣人和哲人提出了和谐价值体观，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自我身心的和谐。和谐思想认为，宇宙有一种使事物由不协调达到协调、由不平衡达到平衡的本能，这种本能通过事物之间的合作、冲突、斗争等运动形式表现出来。所以，遵守天道（宇宙规律）、地道（地球规律）、人道（人类社会规律），合理、妥当、恰到好处地处理问题，是解决矛盾、冲突的有效途径。和谐价值观对于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它遵守的是和而不同，多样共存，互利合作的原则。

2.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当今中国的对外政策？

在现实政治中，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其价值观及其思想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领导人及外交决策者选择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中国传统的“和谐”价值观给中国外交提供了这样一些启示：

第一是和而不同，就是宇宙存在多样性的统一。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都存在差异，但是差异并不等于矛盾。事物之间的差异有时会演化成矛盾，而有时却可以转化为和谐的必要条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很多因为差异而紧密合作的例子，比如男女、夫妻。因此多样性的统一是新事物形成的一种基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指的就是君子有自己的观点，不盲目附和别人，却能够求同存异、和谐共处。这样的思想对于中国领导人选择外交战略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原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2002年访美时就阐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他指出，“和而不同”是说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和谐亚洲”、“和谐邻邦”的理念，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价值观的直接运用和体现。

第二是大国尊重小国的思想。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也。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意思是说大国要尊重小国，才可以取得小国的信任，大国与小国应该互相尊重。大国要像江海一样深广，善待其他国家，才能容纳百川，成为百川之王。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外交上的体现就是中国政府倡导“睦邻、富邻、善邻”的外交方针。倡导国家之间平等、互利、互助、合作、共赢的思想，强调尊重别国的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方针。

第三就是高处不胜寒的思想，《易经》中的乾卦有一句话：“亢龙有悔”，意思是说龙飞到极高的地方会因空气稀薄寒冷窒息摔下来而后悔。老子的《道德经》也强调“物壮则老”，即事物过分强壮容易衰落。这个思想告诉我们，大国不要走极端，不要追求登峰造极的状态。中国政府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就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四是要合理妥当、恰如其分的斗争。对待非对抗性的矛盾要用协调、平衡的方法去处理，尽可能使不协调达到协调、不平衡达到平衡。而对于对抗性的矛盾，如外国侵略，本国主权、领土、生存、安全等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要进行自卫反击，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

用正义的战争对付非正义的战争。中国有句老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和谐并不是和稀泥、绥靖、妥协，更不是凡事都保持中立和弃权。而是强调用合乎规律、真理、法则的方式合理地进行斗争，用适宜、恰当的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

3.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是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极其丰富，儒、佛、道是主流，其中儒家自汉武帝以后就被确立为国学。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思想流派存在，比如法家，墨家，孙子兵法等诸子百家。儒家是官方倡导的，佛家也曾经在一些朝代被朝廷所尊崇，道家主要是在民间流传的，这三者互相融合交汇形成中国传统主流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精华和先进价值观至今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大陆兴起的“国学热”，民办学校讲授中国古代经书，许多家长送孩子去学习儒家经典和道家著作，反映了在市场经济及价值观多样化的形势下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中国政府大力倡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体现了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哲学、阴阳辩证法对人们认识世界，进一步走向文明具有指导意义，和谐、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与当代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以及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人类自由、解放、全面发展等价值观相融合，将会形成更加先进的价值体系。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当今中国主流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当然，在建构当今中国主流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比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皇权主义、家长制和歧视妇女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要提倡的是公民之间互相尊重，每一个人具有人的尊严的仁、义、礼、智、信，而不是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相一致的仁、义、礼、智、信。

4.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当今中国的发展有何影响？

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系之后，社会出现了价值观多样化、信仰多样化的状况，鱼龙混杂，在一些中国人当中，拜金主义流行，极端利己、坑蒙拐骗行为盛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仁、义、礼、智、信价值观对于纠正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有重要的作用。因为仁、义、礼、智、信符合人的本质需求，这些价值观如果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正义、公平、效率、竞争等当代先进价值观相融合，将会形成强大的无形的精神力量，对改善民风，建立诚信、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具有无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北京电视台的《选择》等栏目所倡导就是现代版的仁、义、礼、智、信。这些节目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收视率很高，就证明了这些先进价值观的积极作用。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仁、义、礼、智、信价值观可以直接与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世界先进价值观相融合，而成为当今中国主流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政治价值观如政德即“为政以德”，民本即“以民为本”等也可以直接采用。这些价值观与人民民主、“为人民服务”等当代价值观息息相通。

5.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西方有何相似之处，有何不同之处？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和谐、仁、义、礼、智、信与当代西方主流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的确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从弘扬人性善的角度出发，倡导人性修养，礼让智慧，虽然中国传统价值观也强调“远小人”，即“仁者爱人，仁者知人”。但总体来说，还是倡导事物的和谐，即合理、妥当、恰到好处地处理问题，使矛盾、冲突、斗争的事物有不平衡达至平衡，由不协调达至协调，从而达至和谐状态。

当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倡导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正义从人性恶的认识出发，对人性中自私、贪婪的一面看的非常透彻，用一整套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抑制人性恶的泛滥。如民主选举、分权制衡、言论自由等，以防止或遏制公权力的私用和滥用。与此同时强调人权和公民权，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要有人的尊严，要敢于竞争和斗争等。

虽然中西方两套价值体系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殊途同归，两套价值体系中的先进价值观都是适应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符合人的本质需求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也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又有相同之处。所以，中西方价值体系中的先进价值观相融合，是建构当今中国主流价值体系的方向。

6. 怎样使外国人更好地理解“和谐社会”的概念，这一概念如何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

最近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变化，价值观和信仰多样化势头加剧，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大量营养，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概念。许多外国人不理解“和谐社会”这个概念，主要是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和谐的概念。也许与英文翻译的 harmony 不能正确地反映中文“和谐”一词的含义有关。英文的 harmony 意即无冲突、无斗争的协调一致，这样的 harmony 社会谁都不会相信在世界上的真实存在，所以，许多外国人认为“和谐社会”是虚幻的、空想的、不真实的。但是，中文的“和谐”一词的意思不是指无冲突、无斗争的协调一致，而是指“和而不同”，多样共存，事物之间由不平衡达至平衡，由不协调达至协调。中文的“和谐”一词有点像英文的“适宜”——Appropriate，即按照规律、真理、法则适宜地做事，适宜地处理问题，达至事物的协调与平衡，可持续发展。所以，和谐社会并不是无冲突、无矛盾的社会，更不是杜绝了竞争和斗争的社会，而是国家政府遵守“道”即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做事的社会。对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尽量用平衡、协调利益关系的方式加以处理，尊重人权和民权；对外来侵略霸权采取正义自卫的斗争，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7.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对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不太大，西方主流价值体系对世界影响较大。但随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年”等文化活动的开展，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和谐价值观倡导的“和而不同”、“多样共存”、“互利合作”等思

想将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思想还是和谐与合作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中国外交中有许多体现。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就是本着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建立发展的，十多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中国一直扮演着协调人的身份，在协调矛盾，缓解当事国的对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美关系中，中国不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在不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直接对抗美国，善于平衡协调中美之间的利益矛盾，遵守现有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规则。这些外交政策的推行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合作有重要贡献。

[学术园地]

海峡两岸欧洲研究学术研讨会清华大学分会场会议综述

2012年10月12日上午，由中国欧洲学会主办，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承办的海峡两岸欧洲研究学术研讨会清华分会场在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四十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其中十七名学者来自台湾，大陆学者分别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大会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暨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史志钦教授主持，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郑燕康教授及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致开幕辞。



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合影

一、欧盟新动向

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欧盟新动向”为主要讨论议题。来自台湾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的朱景鹏教授发表了对于欧盟公共治理如何发展的看法，分析了欧盟一体化理论和模式的变迁，提出了有关欧洲的一体化目标向何处去的争议话题。随后，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洪德钦、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台湾欧盟联盟中心主任苏宏达，都以展望未来的视角与大家分享了他们对当前欧债危机的判断和对欧盟一体化发展前景的看法，他们认为，欧盟正处于不确定的发展阶段，有诸多不稳定因素在影响欧盟的未来走向，欧洲一体化遇到了坎坷。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的叶江教授比较认同台湾学者将欧盟的一体化道路界定为新功能主义与自由政府间主义的结合，但是在欧盟是否实现了最初的理想这一问题上持否定态度，叶江教授认为欧债危机的出现让欧盟成为了最为独特的一种国际行为体，欧盟未来的新动向就在于既有政府间组织的特点，又具有超国家倾向。最后，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利华教授作了“从中国与欧盟文化价值观的异同看中欧关系”的主题发言，强调文化价值观的认知差异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并举例分析了双方在理解具体问题上的不同思维角度，在权衡了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基础上，为中国政府提出了具有实践意义的政策建议。下面将与会代表的主要观点归纳为三个方面：

欧盟一体化的发展：不确定的未来

《罗马条约》签订后，西欧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历经十年的时间，在1968年完成了关税同盟的建设，形成了高度一体化的核心六国模式。随着相对的外缘国家不断加入，欧盟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也一直在变迁，欧盟在一体化的治理层面克服着许多困扰。《里斯本条约》之后，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一定调整，欧洲各国希望有更多的发言权，在决策程序上也有所改变，民意调研显示大众对政府的期许程度提高了很多。时至今日，当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发生的债务危机将整个欧盟拖入经济混乱的困境时，欧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在新的现实环境下思考欧盟一体化的治理理论与实践条件。

由此，台湾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的朱景鹏教授强调欧盟一体化的未来面临着两方面困难，第一是一体化的程度需要不断深化，这需要更为深化的一体化政策；第二是一体化的版图范围在不断扩大，未来面临的争议和挑战也在不断加剧。事实上，当前的欧盟在一体化的开放程度上还远远不够，随着欧盟成员国的增加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对于欧盟的整体治理而言意味着诸多影响因素的不确定。

依据上述判断，朱教授对欧盟一体化的治理模式提出了四点建议：加强超国家的集权治理；采取开放协调的方法；实现审议式的民主；促进参与式的治理。但是，对于欧盟一体化的未来治理而言，究竟是允许粗浅的参与就足够了，还是需要实行深入而有力的参与？欧盟未来的目标定位在哪里？等等仍然是不确定的问题。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台湾欧盟联盟中心主任苏宏达教授认为,当前欧盟所面临的主要危机在于信心缺失的危机。欧洲民众对于自身国家和欧盟一体化的发展存在诸多疑虑和不确定情绪,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 对社会福利模式的不确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的社会福利水平获得了大幅提升。这种高福利的社会政策源于欧洲国家在战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繁荣,欧洲各国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大力支持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可以说,欧洲政府几乎负责照顾着每一个欧洲人的生活。然而,随着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接连发生,欧洲的失业率不断高涨,在维持原有的高福利保障体系下,欧洲政府难免陷入财政紧张的困境。因此,当欧盟不得不考虑降低欧洲社会福利的时候,民众不满于享受已久的福利待遇发生倒退,自然产生了对欧洲社会福利模式和政府的不信任。

(2) 对民主治理模式的不确定

“民主”一直是深植入欧洲民众内心的理念,但是,欧洲一体化发展至今,对欧洲的民意调研显示,欧洲公民对“民主政府”的信任程度却一直在降低。他们大多数认为政府利用了民众对民主治理模式的坚定信任,而把“民主”当成政府用来讨好选民的表面功夫,存在造假的嫌疑。因此,这导致了欧洲公民对民主政府和民主治理的怀疑,影响着未来欧盟一体化的民主发展道路。

(3) 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确定

欧洲社会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工业的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不断积累。资本主义将一切事物商品化的本质模式帮助西方国家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以往,民众享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是依赖于政府的大量投入,可是在经济不景气陷入难以自拔的危机时期,政府的财政短缺和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萧条让所有人对欧洲既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产生了不确定、不信任的情绪。

(4) 对欧洲一体化方向的不确定

从目前的欧洲现状来看,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并没有给所有欧盟成员国带来经济上的增长保障。欧盟在成立之初所设定的目标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而对于未来欧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还没有考虑成熟,因此欧盟自身陷入了彷徨和对未来不确定的阶段。

对于欧盟未来的不确定,基本上两岸学者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欧盟是否实现了其最初设定的目标这一问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叶江教授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欧盟希望达成的理想状态从未实现。实际上,欧盟在欧债危机的刺激下正逐渐演变成国际上最为独特的国际政府行为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欧盟成员国的国内法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欧盟法的制定范围,例如德国对本国主权的维护,不会再让渡更多主权;属于欧盟机构的专属权限大

于国家在该事项上的权限，促进政府间的合作成为欧盟的主导方向；在东盟地区论坛等类似场合，欧盟表现出对美国声音的附和。上述的所有表现揭示了欧盟未来在属性上的发展趋势，成为既有政府间组织的特性，又具有超国家倾向的国际政府行为体。

欧债危机的发展：政府间机制得到促进

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的洪德钦研究员从欧债危机的视角分析了欧盟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回顾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系列的成就后，洪德钦研究员将欧盟曾遭遇过的五次重大危机一一列举出来，包括 1965 年的空椅政策危机、1966 年至 1991 年共同市场的停滞发展、2004 年和 2007 年欧盟扩大时出现的争论危机、2005 年法荷公投时引发的反对欧盟宪法危机，以及 2009 年至今没有平息的欧债危机。通过分析和归纳，欧盟在以往遭遇危机时多是通过出台相应的欧盟法案或条约予以制定治理危机的进一步政策。例如在 1966 年通过了《卢森堡协定》结束了空椅政策，在 1986 年至 1992 年先后制定了《欧洲单一法令》、《单一市场计划》和《欧盟条约》化解了共同市场的发展障碍等。

2008 年 9 月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在最初施行了扩大财政支出的缓解困境的措施，为后续的危机加剧埋下了伏笔。当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时，成为了目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导火线。欧债危机暴露出欧盟自身的多种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ECB 不得不扮演最后救援者角色；（2）欧元区采取单一货币政策，但会员国仍保留独立的财政政策；（3）松散的财政纪律导致会员国的严重预算赤字及财政赤字，违反欧盟“稳定与成长协定”，以及“经济趋同标准”中预算赤字及负债总额分别不得超过各国 GDP 3%及 60%的规定；（4）会员国经济结构与发展条件的差异性。同时，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的衰退也为欧债危机带来了更为负面的影响。

2011 年 10 月 27 日欧盟领导人峰会达成三项协议，被视为救治欧债危机的三帖猛药，其主要内容是：（1）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 EFSF），规模从 4400 亿欧元扩大为一万亿欧元；（2）希腊债券减值 50%；（3）将欧洲主要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 9%。

就欧债危机的最新发展来看，存在如下几个值得探讨的情况，例如针对希腊第三轮救援计划是否能够获得支持，希腊债务危机是否具有外溢效果蔓延至西班牙、意大利及葡萄牙等国，以及欧盟的金融改革方案能否生效？欧盟正在努力实行银行方面的单一监管制度和银行联盟制度来维护稳定。

中欧关系的未来发展：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中欧之间存在价值观差异是无需争议的事实，但是有关文化价值观因素是否成为中欧关系的处理过程中值得研究的重点还有待明确。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的张利华教授在会议上特别针对该问题发表了她的观点。目前在中国大陆，一部分从事欧洲研究的学者认为，中欧双方在价值观方面产生的争论属于无实际意义的口水战，不需要投入过多的研究。但是，

从实际情况来看，欧洲议会自 2003 年以来就持续地将“人权”、“西藏”和“改造中国”等关键词置于欧盟对外政策的纲领中，这种事实无不证明了欧盟对文化价值观议题的重视。关键问题在于理清欧盟频繁打出“人权牌”、“民主牌”的目的何在，是出于打压中国而借用的工具，还是为了改变中国价值观的最终目标？张利华教授选取了几个具体概念的理解差异反映出中欧双方在认知内涵上的区别，例如对于“法治”，欧盟将其理解为多党议会制下的法治，而中国则将共产党领导下的守法政府、管理社会的法律规范视为法治。但总体上中国对待这种差异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主动学习欧盟的价值观，不存在质疑和挑剔，而欧盟却时常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习惯抱以批评态度，认为中国在很多文化价值观方面存在缺失。总而言之，中国与欧盟应当互相理解，互相学习，中国需要站在道义的角度制定更为先进的价值观。

二、欧洲教学与研究经验

会议第二阶段的讨论以“欧洲教学与研究经验交流”为主题，分别由来自四川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向到场的海峡两岸代表介绍他们的办学历程和教学体系的建设情况，在分享各自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对在座的专家学者提出了他们的困惑和问题。代表们的精彩发言引起了与会同仁的热烈讨论和积极回应。

本次会议是海峡两岸欧洲研究学者继去年在台北会面后，今年在大陆召开的海峡两岸欧洲研究学术会议。两岸学者在此平台拓宽了学术交流的议题范围，畅所欲言，深入探讨了欧盟相关论题，双方都互有心得，获益匪浅。作为会议主办方的代表，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伍贻康在致会议结束辞时对这种形式的互动交流表示了赞赏，并表达了未来应当创造更多机会让海峡两岸的学者相互争辩、相互学习的期望。会议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都希望能继续加强海峡两岸欧洲研究学者的互动和交流。



伍贻康副会长做会议总结

（撰稿人：袁帅，摄影：刘爱明）

“中欧关系与欧债危机新动向”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2年10月20日,由清华-格罗宁根《中欧关系研究合作项目》主办的“中欧关系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研讨会在新斋353会议室召开。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利华教授主持了开幕式,荷兰格罗宁根大学Jan van der Harst教授主持了研讨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常务副主任孙学峰教授到场致辞。

研讨会共邀请了八位来自中欧的知名学者和欧洲研究专家作为发言嘉宾,中方代表包括欧盟让莫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宋新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崔洪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田德文研究员,欧方代表包括欧盟驻北京政治事务一等参赞Frederic Maduraud博士,荷兰Clingendael学院的Ingrid d'Hooghe博士,上海-法国昂热管理学院Frauke Austermann博士,及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Frank Gaenssmantel博士,意大利塔兰托大学的Luigi Bonatti教授。

会议前半段的议题围绕当前中欧关系面临的新挑战而展开。Maduraud博士从三个方面表达了他的主要观点,包括中欧面临的共同挑战,中欧关系的发展前景,以及欧盟峰会所反映出的政策困境。首先,他分析了中欧未来发展的主要阻力,认为能源短缺困境是中欧双方今后要共同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当中国从发展中国家逐步向世界强国的地位迈进的阶段,资源问题将会更中国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由此,能源利用的有效性成为值得中欧双方合作的重要研究项目。在中欧关系方面, Maduraud博士从双方的政权结构和外交立场出发,提出中国正处于领导人变迁的过渡阶段,政治稳定和平衡发展是当前中国最要紧的任务,而欧洲目前陷入债务危机的同时,很多社会问题、安全问题和民族问题等纷纷暴露出来,因此,中欧应当加强在安全及防务等方面的合作,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也有助于促进中欧更深入的交流。从最近两次召开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的情况来看,欧盟的政策导向是有新变化的,具体表现在欧美之间的对抗不再显现,这反映了欧美关系在实质上是并不互相抵触的。

宋新宁教授将欧债危机的影响通过五个方面进行了细致分析,他认为(1)对于某些国家而言债务危机是比较严峻的打击,但是对于欧盟一体化而言则并非是完全负面的影响;(2)欧债危机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并不能断言是欧洲的社会安全模式除了问题,因为任何国家、任何模式都不可能是完美的;(3)欧债危机给一体化带来了一定阻碍,但是对于欧洲的政府间合作有挑战也有新的机会值得期待,对欧盟成员国的主权而言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4)危机影响到了欧盟的经济和安全,但是在外部直接投资方面的数额减少未必是消极影响;(5)中国的欧洲问题研究学者相信欧洲是有能力自救的,一体化仍将继续深入,而中国与欧盟的合作应当继续拓展,加速协商,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欧盟度过危机。

Hooghe 博士研究了欧洲人在经历欧债危机后对中国的认识发生的转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崛起,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国家都在以积极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国家影响力,但是从英国 BBC 公司的问卷调研结果中看到,英国、法国和德国对于中国的好感程度在最近三年有下降趋势。尽管中国已经被认可为世界领先的经济行为体,但是在政府执政方式、对待工人和农民的方式等方面仍存在质疑。欧洲对于中国的负面认知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原因,包括中欧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欧洲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有潜在的恐惧,以及欧洲人大部分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较低。事实上,目前欧洲的年轻人对中国的积极情绪更加明显,因此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需要更多年轻人的参与。

Austermann 博士采用详细的数据分析向在座同仁介绍了欧盟代表在世界范围的分布情况,以此证明欧盟的政治角色在不断加强,欧债危机的发生也为欧盟的政治影响提供了强化的契机。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欧盟驻华使团在中国的发展迅速,从 1988 年建立驻华机构开始,至今已经发展成欧盟在世界范围内派驻代表最多的国家,共有 140 余名工作人员。欧债危机的发生也为欧盟外交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要节约内部资源,可以通过向外输出欧盟代表与他国合作的模式,另一方面也能利用成员国与他国的双边关系促进经贸合作,最终为欧盟外交的进一步整合提供重要的战略依据。

后半段会议主要研讨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最新发展,崔洪建研究员通过区分学者和官方对欧洲及欧盟的不同理解,强调了欧盟应当被视为世界第一大经济行为体,同时是比较特殊的区域性组织,对于官方而言,欧盟被视为国家的集团,但是学者视野中的欧盟更应该视为传统意义的权力和软权力,金融危机不意味着欧盟的失败。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原因在于,欧盟的一体化程度很高,作为一体化程度非常高的国际组织,欧盟与东盟、非盟等有很大的不同。《里斯本条约》以后,欧盟一体化深入发展,尤其是在法律权威方面取得较大进步。以往欧盟在经济外贸领域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较多,这方面欧盟既有在 WTO 框架内的多变协商,也有自由贸易方面的双边协商。中国与欧盟在安全与防务方面的合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以往中国与欧盟的军事合作一般是以中法、中英、中德等双边形式出现,还没有中国与作为整体的欧盟合作的情况。在地区和国际范围内的军事合作,既有像在索马里时双方合作较为顺利的情况,也有像利比亚和叙利亚双方较多抵触的情况,双方需要以实用且理性的视角维护并发展中欧关系。欧盟继续深入发展,需要面对内部的相关争论,做好内部的整合与平衡工作,例如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与各成员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不同利益诉求甚至是冲突的。巴罗佐试图解决欧盟在联合国安理会代表权问题也将遇到相当大的挑战。

Bonatti 教授作为经济学专家帮助大家认识到了欧盟货币体系与欧元背后的深层次经济动机,并从欧盟核心国与外缘国的竞争结构出发分析了意大利等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和核心国家面临的两难困境。在欧债危机中,以德国为代表的核心国家试图通过欧洲稳定机制来消除来自边缘国家的对欧元造成的竞争性贬值冲击。边缘国家需要来自外部的稳定机制,用来购买债券以增强其信用,紧缩经济,规范物价和工资。在欧债危机根源方面, Bonatti 教授认为欧洲央行的反通胀倾向和单位劳动成本相互脱节,既是金融市场的失败,也是欧盟机构的失败。危机发生后,边缘国家面临债务负担过重和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核心国家则必

须放弃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限制工资增长以恢复竞争力。对于边缘国家面临的债务过多和增长乏力这两大难题，必须削减其政府开支，使欧洲央行发挥作用，然而这两项任务都将面临严重的挑战。

田德文研究员的发言主要围绕着“欧洲的社会模式在欧债危机中的调整”展开。政府公共支出过多是引发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寅吃卯粮，花自己没有的钱已经造成了重大错误。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是在工业社会中满足基本需要和防范风险，具体承担的成本需要个人、家庭、企业、社会和国家共同支付。国家需要做的是通过累进税制和国家保险建立严格的再分配体系。欧债危机前，欧洲国家的社会保障已经转向社会福利方向扩大，国家整体竞争力下降，但是社会福利支出很难减少，劳动力市场趋近于僵化，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福利作为社会进步的象征，同时也具有再生产的作用，但是需要对高福利加以严格限制，做到养老金等的可持续发放。对于国家而言是接受高失业率还是很多低收入的工作呢？



研讨会主持人与发言人合影

嘉宾发言后由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 Frank Gaenssmantel 博士和 Jan van der Harst 教授进行总结，之后由大家自由发言提问，主题发言人积极地做出了回应，会议讨论气氛热烈，取得了圆满成功。

（撰稿人：袁帅、王亮，摄影：刘爱明）